

自由與權力

——阿克頓勛爵說文集

作者 阿克頓 (Lord Acton)

譯者 侯建 范亞峰

導讀 周樑楷

Lord Acton

自由與權力

——阿克頓勛爵說文集

著 —— 阿克頓（Lord Acton）

譯 —— 侯建 范亞峰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自由與權力／阿克頓(Lord Acton)著；侯建，范亞峰譯 -- 初版 -- 臺北縣新店市：桂冠，2004 [民 93]

面：公分。

譯自：Writings on religion, politics, and morality
calssic definitions of modern liberal doctrine

ISBN 957-730-501-6 (平裝)

1. 阿克頓 (Acton, Lord, 1834-1902) 學術思想-
政治

570.941

93015017

86001

自由與權力

——阿克頓勛爵說文集

Writings on religion, politics, and morality calssic definitions of modern liberal doctrine

著者——阿克頓 (Lord Acton)

譯者——侯建 范亞峰

責任編輯——劉彥廷 張碧霞

出版者——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——台北縣 231 新店市中正路 542-3 號 2 樓

電話——02-22193338 02-23631407

購書專線——02-22190778

傳真——02-22182859~60

郵政劃撥——0104579-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廠——海王印刷廠

裝訂廠——欣亞裝訂公司

法律顧問——端正法律事務所

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

初版一刷——2004 年 9 月

網址 ——www.laureate.com.tw

E-mail——laureate@laureate.com.tw

本書若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調換

ISBN 957-730-501-6 定價 —— 新台幣 350 元

導讀

破解權威論述的世界文化遺產： 阿克頓的歷史思維與自由主義

周樑楷（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教授）

一、重新閱讀阿克頓

西元十四世紀的時候，生長於義大利佛羅倫斯（Florence）的但丁（Dante Alighieri, 1265-1321A.D）曾經說：

只有服從理性，只有全心全意為實現人類目標而奮鬥，人類才有自由。

這樣的自由只有在世界政治機構的治理下才有實現的可能。^①

① Dante Alighieri,《論世界帝國》（De Monarchia），朱虹譯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0），p.28。

他又說：

在那包含著正義的世俗意志之中，世界君主的意志是最純正的…。在世界上所有人之中，唯有那世界君主最富有正義感。^②

到了十九世紀，另有一位歐洲學者說：

自由的涵義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：①它是對身處弱勢的少數人的權力的保障。②它是理性對理性的支配，而不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。③它是對超越人類的天主（上帝）所盡的義務。④它是理性支配意志。⑤它是公理戰勝強權。^③

同時，他又說：

權力導致腐敗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。^④

以上這兩位知識份子所陳述的理念，有一部份可以說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他們都嚮往自由，並且強調理性與自由的關係。就這部份來說，但丁似乎已經是位「現代人」了。然而，就另部分來看，這兩位知識份子卻背道而馳，各持相反的意見。但丁不諱言

② 同上，p. 26。

③ Lord Acton, 《自由與權力》，侯健和范亞峰 譯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1），p. 308。

④ 同上，p. 342。

「世界君主的意志是最純正的」，這種論調擁護個人的權威標準的菁英主義（elitism）。而另位近代學者則強調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」。這句話在近百年來不斷地被傳頌，以致於許多人都當作至理名言，尤其在二十世紀這個所謂「極端的年代」（Age of Extremes）裡，出現了不少絕對的權力者，足以映證這句箴言的確可靠，更具有「現代」意義。⁵但是，這句話從誰的口中先傳出呢？知道答案的人有限。如果更進一步追問，誰瞭解這位先賢也是位史家，曾經主編過《劍橋近代史》（*Cambridge Modern History*）就更少之又少了。

阿克頓勳爵（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, 1834-1902，簡稱 Lord Acton）被公認是十九世紀最博學多聞的西方學者之一。他除了曾讀萬卷書，更曾行過萬里路，足跡遍及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俄國和美國等地。他的思想和見聞就如同他的行蹤一樣，並不局囿在窄狹的空間裡，因此，他被稱作是超越原有國籍—英國—的世界性人物（cosmopolitan）。儘管阿克頓在世時因為學識博雅、道德崇高，而受時人頌揚，晚年更於一八九五年被延聘為劍橋大學近代史的國家講座教授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, Cambridge University），然而可能由於他生前並未完成任何專著，只有部分零星的作品在剛過世後才被整理成匯編，所以一度為人淡忘。⁶

⑤ 霍布斯邦（Eric Hobsbawm）稱二十世紀（1914-1991）是「極端的年代」（Age of Extreme），參見 Hobsbawm, *Age of Extremes,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, 1914-1991* (London: Abacus, 1995), pp. 1-17。

⑥ G. P. Gooch, *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 (Boston: Beacon Press, 1952), p. 354, f.1. 附有 Lord Acton 過世後不久，經整理出版的遺作。

古奇（George Peabody Gooch, 1873-1968）最早公開推崇阿克頓的學識。他的《十九世紀歷史學和歷史家》（*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）於一九一三年首度出版。其中以佔有半章的篇幅評介阿克頓的史學成就。直到一九五二年古奇重新改版這本書時，仍然對阿克頓讚不絕口。⁷古奇所以歌頌阿克頓，大概有兩個理由：第一，古奇分析史學史的發展時，是從日耳曼講起的。他說尼布爾（Barthold Georg Niebuhr, 1776-1831）是近代史學界中第一位領導人物。⁸而後，古奇又讚許《德意志史料集成》（*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*）的前後幾位編者，其中有施泰因（Freiherr vom Stein）和博默（Boehmer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兩位學者都受到德林格爾（Johann Ignat von Doellinger, 1799-1890）的推崇，而阿克頓又是德林格爾在慕尼黑大學（Munich University）的及門弟子。⁹換句話說，從尼布爾、施泰因、博默、德林格爾到阿克頓本人，學術香火綿延不斷，一脈相承。再值得注意的是，古奇也參與阿克頓的學術團隊，為《劍橋近代史》撰文，完成〈歷史科學的發展〉一章。¹⁰古奇特別指出阿克頓：

由於深感當時日耳曼思想界的生動活躍，以及他
〔阿克頓〕本國〔英國〕天主教會的思想僵化，他下定
決心要把近代學術研究的酵母輸入英國。¹¹

⑦ *Ibid.*, p. 354.

⑧ *Ibid.*, p. 14.

⑨ *Ibid.*, pp. 61-65.

⑩ *Butterfield Papers*,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, BUTT/310.

⑪ Gooch, *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, p. 355.

第二，古奇本人的求學及家庭背景都和阿克頓相當類似。古奇先後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（Trinity College）和柏林大學（Berlin University）就讀，聆聽過蘭克（Leopold von Ranke, 1795-1886）講課，頗受當時日耳曼史學思潮的洗禮。除外還有一層更深的關係是，古奇夫人屬德國籍，所以他們一直與德國人士情誼篤厚，例如：在納粹（Nazi）崛起後，有些德國自由派人士流亡到英國，古奇慷慨解囊協助他們，並且將他們安置在倫敦（Kensington 區內）的自宅中，一直到大戰結束。¹²而阿克頓的母親（Marie Pelline de Dalberg）是日耳曼貴族的後裔，世居巴伐利亞（Bavaria）；阿克頓夫人（閨名 Marie Acro-Valley），原來是位德國的女伯爵，地位崇高。由此可見，阿克頓和古奇這兩個家庭都與日耳曼人有姻緣關係，他們偏愛日耳曼史學的傳統，除了學術理由外，家庭和社會背景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。

在阿克頓日漸被人淡忘的時候，另一位英國史家巴特費爾德（Herbert Butterfield, 1900-1979）再度提醒世人阿克頓的偉大貢獻。巴特費爾德曾於一九三〇年以《惠格的歷史解釋》（*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*）抨擊本國傳統的史學思想。他認為十九世紀執英國史學牛耳的史學大家，例如馬考萊（Thomas Macaulay, 1800-1859）等人，都存有黨派偏見，而且他們個個都自以為是，把一部英國憲政史當作惠格黨人的奮鬥發展史。¹³然而，到了納粹極權政治威脅西方自由主義時，巴特費爾德修正了原先顛覆性的論述，改為替惠格歷史解釋辯護。也許基於同樣的道理，他大

¹² *Butterfield Papers*,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, BUTT/310.

¹³ Herbert Butterfield, *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*, London: G. Bell & Sons, 1963 (c. 1931).

約在一九四〇年初期起大力推崇阿克頓。¹⁴一九四八年，巴特費爾德曾發表《阿克頓》（*Lord Acton*）一本專輯小冊，發揚這位劍橋大學的先輩學者。¹⁵而後，一九五五年在《人類話往事》（*Man on His Past*）中，巴特費爾德直接闡明阿克頓如何繼承日耳曼史學的傳統。¹⁶這本書幾乎把阿克頓奉為近代英國史學的第一人。在劍橋大學圖書館（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）裡典藏的《巴特費爾德文件》（*Butterfield Papers*）中，可以發現他曾經與劍橋大學出版社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）的編輯不斷往返聯絡，這些書信的內容都是為了出版阿克頓的著作文件全集。¹⁷可惜他的熱誠因為對方在商業考量下，最後終於化為煙雲。直到今天，任何人有意參閱阿克頓的第一手史料，都得親自到劍橋大學圖書館走一趟。

由於巴特費爾德的推崇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六〇年代初期興起一股研究阿克頓的熱潮。這段期間有不少專書出版，評

⑭ Owen Chadwick, "Acton and Butterfield," *The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*, vol. 38, No. 3 (1987), p. 386, 另外參見, "Address" by Prof. Owen Chadwick at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Sir Herbert Butterfield in Great St. Mary's Church on Saturday, 13 Oct., 1979, in Rare books Room,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.

⑮ Herbert Butterfield, *Lord Acton*, London: G. Philip & Son, 1948.

⑯ Herbert Butterfield, *Man on His Past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55.

⑰ *Butterfield Papers*, BUTT/6, 這些信件多半寫於一九四五年間。而阿克頓生前的著作、文件、筆記及藏書現在都典藏在劍橋大學圖書館之中。參見 Owen Chadwick, "The Acton Library," in *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: The Great Collections*, ed. By Peter Fox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), pp. 136-152.

介阿克頓的政治思想和史學思想；¹⁸因而阿克頓在人們的印象裡，不再僅止於「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」那句箴言而已。假使沒有巴特費爾德，阿克頓是否能高度受到重視？這是一個值得討論及非常有趣的問題，因為從阿克頓、經古奇，再到巴特費爾德，這三位史家之間隱藏著一道微妙的關係。我們可以說，他們有共同

⑱ 這段期間出版阿克頓的著作有：

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, ed. By G. Himmelfarb, Glencoe, Ill.: The Free Press, 1949.

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,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. Trevor-Roper, New York: Meridian Books, Inc., 1961.

Historical Essays and Studies, ed. By J. N. Figgis and R. V. Laurence, New York: 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, Inc., 1967.

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, ed. By W. H. McNeill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7.

而有關評介阿克頓的著作有：

Gertrude Himmelfarb, *Lord Acton: A Study in Conscience and Politics*, London: Routledge & Paul, 1952.

G. E. Fasnacht, *Acton's Political Philosophy*, London: Hollis and Carter, 1952; Lionel Kochan, *Acton on History*, London: A. Deutsch, 1954.

Gertrude Himmelfarb, *Lord Acton: A Study in Conscience and Politics*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2.

Butterfield, "Acton: His Training, Method, and Intellectual System" in A. O. Sarkissian ed., *Studi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in Honor of G. P. Gooch* (New York: Barnes & Nobles, 1962), pp. 169-198.

David Mathew, *Lord Acton and His Time*, London: Eyre & Spottiswoode, 1968.

Gertrude Himmelfarb, *Victorian Minds*, New York: Knopf, 1968.

David Mathew, *Lord Acton and His Times*, London: Eyre & Spottiswoode, 1968.

Damian McElrath, *Lord Acton: The Decisive Decade 1864-1874*, Louvain: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, 1970.

的學術領域（即十八、十九世紀的歐洲外交關係史）、共同的政治理念（即超越國家主義〔nationalism〕的世界觀和自由主義）以及共同的史學思想（即以德國史學爲主流，一脈相承的觀念論〔idealism〕）。不過，自從六〇年代以來，左派及激進的社會思潮一波緊接著一波，衝擊著原有的體制和思想，於是相形之下阿克頓的自由主義顯得過於溫和保守，同時他的史學也歸類爲唯心論（idealism）。阿克頓在學術史的名望再度受人淡忘，直到今天有興趣專題研究阿克頓的學者可能屈指可數，寥寥無幾；這也難怪劍橋大學圖書館裡的「Acton Library」總是顯得冷清了一些。

雖然形勢比人強，阿克頓的風光不再，但是在二十一世紀裡，我們還是值得重新認識阿克頓。¹⁹本文將討論歷史思維（historical thinking）或歷史意識（historical consciousness）如今已成爲世界的文化遺產，它是由上兩個世紀許多東西方史家共同奮鬥努力而奠定起來的，阿克頓本人的貢獻不僅不該被遺忘，而且值得一提再提，溫故而知新。阿克頓的自由主義是種政治信念，也是把利刃，直接穿戳當時教皇（Pope）的胸膛；還有，阿克頓的觀念論治史取向並非科學派史學（scientific school of history）的門派，表面上他所標榜的歷史思維似乎只是純學術性的，爲歷史而歷史的，其實它更是種批判的工具，可以和自由主義相互爲用。阿克頓的現實意識（presentism）以自由主義爲立場，他的史學思想強調觀念論的歷史思維，兩者之間彼此辯證互動。

¹⁹ 本人曾經撰文討論阿克頓的思想。相隔二十幾年之後，重新改寫，並發表本文，所以首節以「重新閱讀阿克頓」為題。參見周標楷，〈論阿克頓在近代史學思想中之地位〉，原載於中興大學《文史學報》，第六期（1976.6）；後轉錄於周標楷，《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》（台北：唐山出版社，1996），增訂版，pp. 185-208。

二、軟中帶硬的自由主義

阿克頓所以是位世界性人物及自由主義者，與他個人特殊的家世背景和教育環境有關。^②

阿克頓家族來自英國古老的鄉紳世家，早在十四世紀初期（於 Shropshire）有塊封地。阿克頓的祖父（Sir. John Acton, 1736-1811）世襲這封地及「從男爵」（baronet）的爵位。不過，他一生多半住在國外，並且身居要職，曾經於一七七九年至一八〇四年間擔任兩西西里王國（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）的首相。由於這種關係，當一八三四年一月十日阿克頓出生時，他的雙腳並非落在英國，而是遠在地中海的拿不勒斯（Naples）。

阿克頓的父母雙方都屬於貴族和虔誠的天主教家庭。在教會中，他們的族人頗有地位。阿克頓的叔父（Charles Edward Janurius Acton）於一八四二年晉升為樞機主教。又如，阿克頓母親的叔祖父是梅因茲的大主教選侯（Archbishop-elect of Mainz，名 Kail Theodor von Dalberg）。自幼生長在如此濃郁的天主教氣氛中，潛移默化，無怪乎阿克頓的學術思想充滿宗教道德的情操。

一八三七年，阿克頓只有三歲時，不幸父親（Sir Ferdinand Richard Edward Acton）過世。阿克頓繼承爵位，成為第八代的從男爵。三年後，母親改嫁。這位先生（Lord Leveson）的父親是第一代的 Granville 伯爵，在政壇上屬於自由黨，於一八二四年至一

② 本文有關阿克頓的生平背景，主要參考 Himmelfarb, *Lord Acton: A Study in Conscience and Politics*，特此說明，並且不在一一評注。

八四一年任英國駐法大使。阿克頓隨著母親加入這個新家庭時，繼父服務於外交界。Leveson 家族信仰英國國教，所幸沒有干涉阿克頓母子兩人的宗教認同。阿克頓仍然可以從母親身上吸吮天主教的思想。

阿克頓的教育環境也相當特殊。年輕時代，對他最有影響力的首推 Monsignor Dupanloup。按，Dupanloup 是十九世紀中葉在法國極力促進天主教自由化的要人，也是阿克頓和 Dalberg 兩家的好友兼告解神父。阿克頓的母親改嫁後，仍然常到巴黎請他主持告解。當時 Dupanloup 兼任法國 Saint Nicolas 一所預備學校的監護人。趁此之便，阿克頓就讀這所學校。儘管只有短暫的一年，阿克頓已受 Dupanloup 的影響，種下了「自由化天主教」（Liberal Catholicism）的思想。

一八四三年阿克頓轉入英國 Oscott 的天主教學校。他在這裡前後住了五年。這段期間正好牛津運動（Oxford Movement）如火如荼地展開。所謂「牛津運動」，是從一八三三年起以牛津大學（Oxford University）為中心所引燃的一項宗教活動；主張英國國教在教義上應歸向天主教，並且反對由政府控制教會及任何宗教上的個人主義。這項運動的頂尖領導人有：John Henry Newman，Richard Hurrell Froude 及 Edward Bouverie Pusey 等人。他們的論述主要發表在由 Newman 主編的 *Tracts for the Times* 雜誌上。由於 Oscott 距離牛津大學不遠，自然而然也成為此項宗教運動的重鎮。尤其自從一八四〇年 Nicholas Wiseman 擔任 Oscott 的校長後，他憧憬英國教會重歸天主教的陣營，因此 Oscott 在這項運動中舉足輕重。阿克頓親身經歷這項宗教運動，心靈上不免烙印著極深的印象。不過，他對於 Wiseman 並沒有盲目的崇拜。因為這位校長外務多，成天接待有名望的訪客，名利薰心似乎超過了宗教上的

誠意。

一八四八年阿克頓離開 Oscott，轉往蘇格蘭的愛丁堡（Edinburgh）。他沒有進入正式的學校，只請 Henry Logan 當私人教師，教授希臘文，以便能申請入大學。可是沒想到整整花了兩年的時間，效果不理想。失望之餘，只好又離開愛丁堡。這件事令人費解，因為像阿克頓在十歲以前早已通曉英、法、德及拉丁語等，現在反而只認識不到五百個希臘文單字。

本來阿克頓有意申請到劍橋大學就讀，可是此刻劍橋大學對天主教徒頗有顧忌，深恐捲入宗教上的爭紆，阿克頓終於被拒門外。人事因緣變化莫測，有時候似乎捉弄個人。一八九五年，也就是阿克頓遭劍橋拒收之後的四十五年，他反而被禮聘為該大學的國家講座教授。在就職典禮的演說上，阿克頓以既幽默又微帶諷刺的口吻提起這段往事，真是耐人尋味。^①

一八五〇年六月，阿克頓離開英國前往慕尼黑（Munich），住宿在德林格爾的家中。當時德林格爾已是位知名的天主教學者，學識淵博，精研史學、語言學、哲學及神學；他的著作《教會歷史》（*Church History*），先後被譯成英、法、義大利文，享譽天主教世界。^②阿克頓選擇到慕尼黑，一方面因為這個城市有淳厚的天主教色彩，學風也比較保守；另一方面因為此地的 Acro-Valley 家族與德林格爾有親戚關係，阿克頓仰慕德林格爾，援此關係成為他的弟子。日後，Acro-Valley 家的小姐（Marie Acro-Valley）也嫁給了阿克頓。

① Lord Acton, "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of History," in *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* (New York: Meridian Books, Inc., 1961), p. 17.

② Gooch, *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, pp. 503-505.

德林格爾指導阿克頓非常認真，師生關係相當接近。一八五〇年代期間，阿克頓對德林格爾的學問相當佩服，稱讚他是「參考書」。他們師生兩人原來對教皇的地位相當尊崇，但是一八五四年教皇頒佈「聖靈懷胎說」（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Mary），兩人深表反感。加上在一八五七年春，阿克頓隨老師訪問羅馬的時候，對這個古城的風氣大失所望，所以他們又更傾向「自由化天主教」，並且反對所謂的「教皇至上論」（Ultramontanism）。按，「教皇至上論」早在一八一四年曾經簽署通過。當時拿破崙戰爭已近尾聲，整個歐洲保守勢力抬頭，重振天主教的勢力響徹雲霄，甚至連基督新教的國家也同情天主教會，這也是英國發生牛津運動的時代背景。「教皇至上論」簽署後，羅馬城內立刻重建「宗教裁判所」（Inquisition），並且頒佈「禁書書目」（The Index），一時之間羅馬充滿了肅殺之氣，彷彿重回「反宗教改革」（Counter-Reformation）的時代。後來因教皇易人，「教皇至上論」的權威稍微緩和下來。不過，好景不長，庇護九世（Pius IX, 1846-1878）擔任教皇時，又重申這種學說，並且提升為無限上綱，不容他人的質疑，企圖建立教皇的絕對權力。阿克頓和他的老師訪問羅馬期間，不巧就是這個時候，難怪他們執筆痛加撻伐。除此之外，十九世紀中葉慕尼黑發生宗教和科學的大論戰，爭執的雙方，一派（以 Anton von Gunther 為首）主張宗教和科學二元論，彼此河水不犯井水；另一派（以 Jakob Frobshammer 為主）堅持科學高於宗教之上。羅馬當局對此二說都堅持反對意見，其態度顯然無視於科學知識的存在，這件事更使阿克頓對教皇不滿，加深了「自由化天主教」的意念。

阿克頓也曾追隨德林格爾遊歷各地，足跡遍及瑞士、義大利、奧國及英國。每到一地要不是拜訪士林好友，就是進出各圖

書館和書店。有一次，他們還參加天主教的神學議會，阿克頓因而結識了不少哲學家、神學家、史家及政治家，增廣不少見聞。阿克頓也曾隨繼父兩次遠行。一八五三年他們到美國，除了會見多位文人學者外，阿克頓也收集不少有關黑奴的資料。在阿克頓的心目中，當時的美國是個「生活以賺錢為最大目標的社會」，「讀書不是為學問本身，而是想成為實用的人」。不過，他對美國的政治卻絲毫不吝於讚美。他說：

它〔美國〕既不像歐洲舊政府那樣建立在傳統之上，也不像追隨法國革命的政府那樣建立在原則之上，而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互相妥協和暫時擱置對立原則的對抗的作法上，這些原則的任何一個都不能居於支配的地位。^②

一八五六年他以繼父的秘書為身份、代表維多利亞女王（Queen Victoria）參加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（Alexander II）的加冕典禮。阿克頓批評俄國與美國一樣，都缺乏文化的氣質。

一八五八年，阿克頓離開慕尼黑回到英國。在自宅裡（位於 Shropshire 的 Aldenham）他總共收藏了五萬九千多冊的書籍，以及無數的卡片、資料；而且冊冊幾乎都有鉛筆痕跡，其狂熱的求知欲令人讚嘆不已。一八五九年，他以惠格黨的身份當選國會議員，這是他第一次的從政生涯，也是唯一的經驗。從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五年之間，因為書生本色，不善辭令及政治手腕，他在

② Lord Acton, "Political Caus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," in *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*, p. 174.

議壇上表現平凡。一八六八年有意東山再起，結果落選敗北。

返回英國以後，阿克頓一方面也參與編輯 *The Rambler*。這本雜誌在一八四八年創刊，主張「自由化天主教」，時常與代表「教皇至上論」的另一本雜誌 *Dublin Review* 論戰。不久，阿克頓覺得 *The Rambler* 的言路太窄，轉而投稿 *Home and Foreign Review*。這段期間教皇又發行《邪說匯編》（*Syllabus Errorum*），使得「教皇至上論」如日之中天，阿克頓更加憤慨不已。一八六六年秋，「自由化天主教」人士另外創辦 *Chronicle* 週刊，阿克頓前後投稿，發表不少作品。不久，週刊內部因編者的政治立場不一，彼此互相齟齬，一八六八年宣告停刊。一八六九年，部分「自由化天主教」人士改辦 *North British Review*，阿克頓選定這份雜誌為發表文章的園地。

阿克頓終生孜孜不倦，埋首群書，執筆立說，成為眾所皆知的飽學之士。晚年榮獲不少學術頭銜，實至而名歸，當之無愧。除了被延聘為劍橋大學近代史的國家講座教授，也被聘請擔任《劍橋近代史》的主編。只可惜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九日阿克頓與世長辭，來不及與這套名著見面。阿克頓一生撰述寫作，本來計畫一部空前的巨作，名稱《自由史》（*History of Liberty*），也沒有如願。不過，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短文中，窺視他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思想。

阿克頓出生於虔誠的天主教家庭，所以宗教情操和對教會的情感始終是他個人思想上的原動力。他提倡「自由化天主教」，反對「教皇至上論」。由於立場強硬，筆鋒銳利，曾遭到教會當局的猜忌。有人勸阻他應該溫和一點，他認為神學本身的問題或許可以暫且不談，但是：